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三十一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 裴頠与魏晋玄学

王国棉

王青峰

著

玄学是魏晋时期特有的文化现象,其本质是魏晋士人针对汉代“儒术独尊”所暴露的种种社会矛盾,通过批判体质化的儒教与名教,创造性地利用儒、道两种思想、资源糅合成了儒、道而又超越儒道自身的社会思潮。裴頠是玄学从创立走向成熟的关键人物,他提出“名教高于自然”和崇有论的观点,极大地丰富了玄学的思想体系和哲学内容。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郭红娟

复 审：张静华

终 审：严果生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31辑)

裴頠与魏晋玄学

王国棉 王青峰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625 字数:300千字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978-7-900454-34-8

G·142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 马玉山 | 马志超 | 于贵卿 | 于崇良 | 王克林 |
| 王志超 | 王宝库 | 王灵善 | 王振芳 | 王家璧 |
| 牛崇辉 | 田中仁 | 冯素梅 | 任茂棠 | 刘 巩 |
| 刘在文 | 刘纬毅 | 刘振华 | 刘晓丽 | 成葆德 |
| 齐荣晋 | 李元庆 | 李东福 | 李锐锋 | 吴广隆 |
| 宋丽莉 | 杨二怀 | 杨子荣 | 杨建峰 | 张国祥 |
| 张捷夫 | 张鸿仁 | 罗广德 | 陈长禄 | 胡存悌 |
| 钟声扬 | 赵曙光 | 郑建国 | 降大任 | 郭士星 |
| 郭双威 | 郭维明 | 高 可 | 高专诚 | 陶正刚 |
| 柴泽俊 | 秦海轩 | 梁俊明 | 谢 恺 | 董永刚 |
| 董占锁 | 董瑞山 | 楚 刃 | 雷忠勤 | 霍润德 |

## 目 录

引 子 ..... (1)

一、裴頠简述：辉煌而短暂的一生  
..... (2)

二、魏晋玄学的发展概况  
..... (9)

三、裴頠玄学思想及其在魏晋玄学  
中的贡献与作用 ..... (29)

## 引 子

玄学是魏晋时期特有的文化现象,其实质是魏晋士人针对汉代“儒术独尊”所暴露的种种社会矛盾,通过批判体制化的儒学与名教,创造性地利用儒、道两种的思想资源形成了糅合儒道而又超越儒道自身的社会思潮。玄学既肩负着重要的政治使命,又有着重要的政治价值,是不同政治势力对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态度的直接表现。玄学主要分贵无与崇有两派,玄学的政治主题与核心任务就是要解决“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玄学的终极目的是打破意识形态中“儒家独尊”为儒、道联盟共同主宰统治思想结构的格局;打破君权独尊为君权与士权平衡发展的政治格局;打破单向倾斜于群体价值为群体价值与个体价值相协调,伦理体制化人格和个性化人格融合的格局。从而在政治上既维护儒家关于社会基本秩序的主张,在人格上又兼顾道家尊重个性自由和人性解放的追求。玄学思潮的兴起,充分反映出魏晋乱世知识分子对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关系的反思。玄学的哲学本质是儒学与道学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最终导致儒、道合流共同主宰意识形态的格局。

裴頠是玄学从创立走向成熟的关键人物。裴頠在本体论的哲学基础上,通过批判贵无论的逻辑基石及种种社会危害,以崇有之论驳斥口谈虚浮、不务正事的玄学弊端,突出强调了名教在稳定国家政权中的作用。裴頠提出“名教高于自

然”的观点,针对性强,具有特别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裴頠在众多的玄学家中独树一帜,提出崇有论,为玄学拓展了新的致思方向和学术领域,极大地丰富了玄学的思想体系和哲学内容。

魏晋玄学采取思辨哲学的形态,提出和运用体用、本末、有无、言意等新的哲学方法与范畴,丰富和扩大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范围与内容,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去揭示万物的本原,从而开辟了一代哲学新风。玄学对宋明理学的产生起了催生作用,也对佛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当然也对我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 一、裴頠简述:辉煌而短暂的一生

裴頠(267—300),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属山西新绛县)人。生于晋武帝泰始三年,死于晋惠帝永康元年,晋司空裴秀次子,是西晋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哲学思想家。裴頠的史料主要保存于《晋书·裴秀传》和《全晋文》中。

裴頠出生于一个封建大官僚家庭。其曾祖父裴茂在东汉后期曾任尚书令,汉献帝建安二年(197)因讨伐李傕有功被封列侯。其祖父裴潜,东汉末年曾任代郡太守、兖州刺史。曹丕称帝后,转任荆州刺史,赐爵关内侯,后官至大司农、尚书令,封清阳亭侯,为魏之重臣。其父裴秀自幼好学,8岁能属文。有人把裴秀比作颜渊、子夏,曾有谚语说:“后进领袖有裴秀。”因为裴秀有超常的才华,渡辽将军毋丘俭把他推荐

给大将军曹爽。于是，大将军曹爽把裴秀收为属员，并同意他承袭父亲清阳亭侯的爵位，又授职为黄门侍郎。后来，曹爽因与司马氏争夺政治权力而被诛，裴秀也因为是在曹爽的属官而被罢免。但是，由于裴秀出众的才华，很快又为司马氏起用，任为廷尉正、卫将军司马等。军国大事，大都要采纳他的意见。魏甘露二年(257)，裴秀随司马昭讨伐诸葛诞，因功被提升为尚书，进封鲁阳乡侯，后又迁为尚书仆射。当时，司马氏已有篡魏之心，司马昭欲立次子司马攸为世子，裴秀和贾充等人力谏，使长子司马炎继位。司马炎继位后，即拜裴秀为尚书令、右光禄大夫。司马炎统一天下后，裴秀又升迁为左光禄大夫，封为钜鹿郡公，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受心腹之任。当时有这样的戏言：“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足见这三家在西晋取代曹魏中的作用，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裴秀当时显赫的情况。西晋泰始四年(268)，裴秀被任为司空，居于三公之重位。

这样的家庭出身，为裴頠后来步入政界并形成独特的思想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是，裴頠显赫于西晋政坛与玄学领域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其本人良好的素质和出众的才华。据《晋书·裴頠传》载，裴頠自幼以“弘雅有远识，博学稽古”而知名，为御史中丞周弼誉为“一时之杰”。裴頠的姨夫贾充也认为其“才德英茂，足以兴隆国嗣”。裴秀死后，其爵由长子裴潜所袭，然裴潜早卒，所以在晋武帝咸宁元年(275)次子裴頠被封为钜鹿郡公。这一年裴頠八岁。裴頠成年后，屡任朝廷重臣，议制朝政，在当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晋武帝太康二年(281)，裴頠被征为太子中庶子，后迁散骑常侍。

公元290年,晋惠帝司马衷即位,大权旁落贾后之手,裴頠官转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惠帝元康元年(291),二十四岁的裴頠官升侍中,兼光禄大夫。元康九年(299),迁升为尚书仆射。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起兵,入宫捕杀贾后,裴頠因受牵涉,被司马伦杀害,年仅三十四岁。

裴頠的辩论才能十分突出,被誉为魏晋之际思想界的谈宗之一。《晋书·裴頠传》中记载:“乐广尝与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辞论丰博,广笑而不言。时人谓頠为言谈之林薮。”《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冀州记》中说:“頠弘济有清识,稽古善言名理。”《赏誉篇》注引《惠帝起居注》曰“頠理甚渊博,赡于论难”。《晋诸公赞》中说裴頠与其从弟裴邈清谈,“终日达曙”。与裴頠同时的“贵无论”代表人物王衍多次与裴頠辩论,没有一次难住裴頠。《世说新语·文学篇》载:“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在贵无之论风弥之际,裴頠能高举崇有的大旗与之分庭抗礼,这既说明了裴頠思想的深刻,又表现了其“善言名理”,“赡于论难”的才能。此外,裴頠还曾著《辨才论》,“古今精义皆辨释焉”。虽然未成而遇祸,但我们却可由此而知裴頠对“辨”之精通。

裴頠对道家学说有很深的修养,但其思想总体上以儒家为主。裴頠任国子祭酒时,曾上奏修国学,兴隆礼乐之教。《晋书·裴頠传》载:“时天下暂宁,頠奏修国学,刻写石经。皇太子既讲,释奠祀孔子,饮飧射侯,甚有仪序。又令荀藩终父勛之志,铸钟凿磬,以备郊庙朝享礼乐。”裴頠深知“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只有“训物垂范”,才是“圣人为政之由”,

因此,他想从兴隆礼乐之教入手来振兴朝政。这在当时“处官不亲所司”,“奉身散其廉操”,“砥砺之风,弥以陵迟”的特定条件下,是很有针对性的。

作为西晋政坛中的主要决策者,裴頠的吏治思想是很超前、很独特的。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崇有论》《上疏言庶政宜委宰辅诏命不应数改》等中。具体分三方面来说明。

### (一)唯贤、唯疏的用人思想

裴頠认为,选拔人才当以德才为重,要任人唯贤而不能任人唯亲。当德才相当时,应以疏远者为先,而不应偏于亲友。即“正复才均,当先其疏”,这样才能去“偏私之举”,“以明至公”。裴頠身居重职,在选拔官吏的过程中,裴頠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如张华为庶族出身,但博学强识,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因而受到裴頠推崇。张华在朝中“尽忠匡辅,弥缝补阙”,使晋王朝在“暗王虐后”之时,亦可得一时安宁。贾模为贾后之从兄,贾后干预朝政,“拜模散骑常侍,二日擢为侍中”,是当时朝廷重臣。贾模死后,朝廷欲以裴頠代其专任门下事,裴頠认为这是“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举”,遂上表辞任。他博引古今成败,认为汉朝二十四帝中,只有孝武、光武、明帝不倚重外戚,反而使外戚得以保全。像咎繇、伊尹、吕望、萧何、张良这些功勋卓著的人也都不是外戚。因此,凭德才选择官吏,才能选出真正的有才之士。然而“历观近世,不能慕远,溺于近情,多任后亲,以致不静”,因此要尽量避免外戚专任,虽然外戚中亦有不少德才兼备的人,但在“正复才均”的情况下,则应当以疏远者为先。西汉冯野王以“治事行高”而被推为能行第一,然而只因其妹被汉元帝

立为“昭仪”，便不得居三公之位。裴颢引用这些例子来说明历史上已有回避外戚的先例。裴颢“正复才均，当先其疏”的观点，正是在考察古今成败之后而提出来的，这在当时贾后专权的特定历史时期，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 （二）分工明确、专业化治国的执政理念

裴颢认为，在一个国家内要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这不一个人所能胜任的，因此针对繁杂的事务，要有相应的分工，这样才能把事情处理好。裴颢提出“辨方分职，居任得人”的主张。他认为，如果不把各种事务区分清楚，建立一定的官职，明确各自的责任，就不能处理好各种各样的事务，国家也就难以治理得好。如果不限之以位分，那么“越位干曹”之事便不可避免，使得“莅职者不得自治其事，非任者横干他分”。只有人人都能够对其分内之事“躬其力任”，“自治其事”，对其分外之事不要“横干他分”，整个社会才能和谐。如汉文帝时，陈平为左丞相而不知“簿书之目”，史书赞誉其守职，因为宰相分内之事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至于决狱钱粮，则各有所主。又如，尧、舜的分内之事为求贤，所以尧舜要“劳于求贤”，对其分外之事，则不“横干他分”，所以尧、舜“行不越其分”而“逸于使能”。正是由于这样，尧舜才能够“居任得人，无为而治”。只有“辨方分职”，“班其政刑一切之务，分宅百姓，各授四职”，并且每个人都能“各掌其务”，“各守其所”，众多的事情才能得到恰当的处理。这样国家才会“治道可隆，颂声能举”。

## （三）依法治国、制度化办事的治国方针

裴頠还主张要有相应的规章制度,以作为处理问题的依据和赏罚的标准。否则“功无所归,非无所责,众臣无所适从,群吏不得安业,天下国家必然乱矣。”《晋书·刑法志》载:“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狱,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狱讼繁滋”。对此,裴頠提出“赖恒制而后定”的观点。他认为治理国家应该依法办事,不能感情用事。他说:“夫天下之事多涂,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扰,赖恒制而后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职,为之准局。准局既立,各掌其务,刑赏相称,轻重无二,故下听有常,群吏安业也。”这里所说的“恒制”,就是指一些相对固定的规章制度,所谓“准局”,指统一的标准和限定。处理问题都要按“恒制”和“准局”而行,这样便可以做到公平、公正地赏罚。如果没有“恒制”和“准局”,就会“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因法之多门,以售其情,所欲浅深,苟断不一”。这样一来,则“刑不能禁奸,赏不能劝善”,刑赏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裴頠的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司空见惯,但在一千多年以前则显得难能可贵。

超群的思想成就了裴頠辉煌的政治生涯。裴頠以其“明允恭肃,体道居正”,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尊重和敬仰,被史官赞为“雅望素隆”。在贾后专权,外戚多有随之腾达者。贾后之母为裴頠姨母,故裴頠亦为外戚。但是,对于年少而登高为位的裴頠“四海不谓之以亲戚进也,惟恐其不居位”。即使如此,裴頠仍然觉得外戚不应专任,曾专门上书,博引经史以说明外戚专任之弊。从被征太子中庶子到迁尚书仆射,裴頠多次升迁,“每授一职,未尝不殷勤固让,表、疏十余上,

博引古今成败以为言,览之者莫不寒心”。

当然,也有毁誉者则认为裴頠“欲而无厌,弃典礼而附贼后”。这不是一个大丈夫的行为。《裴頠传》又载:“或说頠曰:‘幸与中宫内外可得尽言。言若不行,则可辞病屏退’。……頠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这又说明裴頠不愿象其前嵇康和其后陶潜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两方面也正好真实地反映了裴頠的双重人格。尽管如此,后人对裴頠的敬仰是不会因此而改变的,裴頠在西晋政坛与玄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裴頠一生著述不少,但流传下来的不多。据史书记载,关于裴頠的著作,应最晚在宋朝之后也就散佚了,再往后,便再也不见记载了。如,《隋书·经籍志》载“晋尚书仆射裴頠集九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载“裴頠集十卷”。今皆不见存。现存裴頠的主要著作,是保存于《晋书·裴秀传》中的《崇有论》。此外,裴頠一些散见的短文,辑入《全晋文》中。另外,关于裴頠是否著《崇有》《贵无》二论,仍有争议。《三国志·魏书·裴潜传》注引《惠帝起居注》说:裴頠“理具渊博,赡于论难,著《崇有》《贵无》二论,以矫虚诞之弊”。《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晋诸公赞》说:(裴頠)“疾世俗尚虚无之理,故著《崇有》二论以析之,才博喻广,学者不能究”。晋人孙盛《老聃非大贤论》说:“昔裴逸民作‘崇有’、‘贵无’二论”。根据这些记载,不少人认为,裴頠不仅著有《崇有论》,而且还著有《贵无论》。但也有人认为裴頠仅著有《崇有论》而未著《贵无论》。

## 二、魏晋玄学的发展概况

玄学是继两汉经学边缘化和名教的衰微而崛起的哲学社会思潮。其发端、滥觞于东汉后期。杨雄曾作《太玄赋》，桓谭评论说：“杨雄作玄书，以为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贤著法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因附属万类王政人事法度。”张衡曾作有《思玄赋》《玄图》。张衡在《玄图》中说：“玄者无形之类，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与先。”汉末“贵玄言，宗老氏”的风气到魏晋之时达到极盛。不同的是，汉代寓天道于物理，以天道排斥神仙图讖之说，而魏晋玄学黜天道而究本体，忘象得意，游于物外，归于玄极，从而脱离了汉代的宇宙论为本体之论。从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起，魏晋玄学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迅速崛起并盛行于魏晋时期。“玄”语出《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当时的名士喜清谈，常以《老》《庄》《易》“三玄”为谈资，并借注释“三玄”来发挥自己的哲学见解，故魏晋时期哲学社会思潮的主流被称为“玄学”。就思想总体特征而论，玄学思潮兴起实质是先秦道家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活跃、转型及道家自然主义与儒家人伦主义的相互会融，充分反映出魏晋乱世人们对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关系的反思。同时先秦道家经两汉至魏晋复兴，因与儒家思想融合而获得新的理论形态，如，何晏在《论语集解》、王弼在《论语释疑》、郭象在《论语体略》中援道入儒，以老、庄自然之道诠释儒家人伦至理，为儒家圣人穿上

道家服装,表现了魏晋玄学融合儒道的时代特征,故玄学又被称为新道学。本体之思、名教与自然之辨、言意之辨等,是魏晋玄学家普遍关注的基本问题。

### （一）玄学兴起的历史背景与演变概况

从政治背景来看,魏晋时期上层统治集团纷争愈演愈烈,在险恶的政治环境和多变的人际关系中,士人大胆直率的批判意识有所收敛,汉末以来评论人物德行的政治清议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逐步转化为对抽象义理、哲学命题的清谈。这种清谈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宇宙本体、政治伦理、言意关系、艺术审美等无不辨析。由此既产生了引导学术深入发展的新载体,也形成了理论探讨的自由氛围。此外,这种形式大大促进了魏晋时代思维方法的锻炼及论辩艺术的提高,为新兴的玄学思潮的发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魏晋名士的风度和才性在清谈中得以充分展现。

从思想背景来看,主流意识形态或统治思想的危机成为玄学兴起的观念触媒。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载:“逮桓灵之世,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这充分反映出汉末政治秩序的混乱引发了文化秩序的混乱,统治危机伴随着思想危机。一方面,儒学的僵化、迂阔与儒家礼教的繁文缛节既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解放和行为自由,也限制了思想学术自身及士精神的自由发展。儒学的价值标准失去了说服力、凝聚力乃至约束力,从而导致了知识分子对儒学的反思与扬弃。因而,儒学与儒教有自身革新扬弃以适应社会需要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道家学说作为儒学与谶纬迷信的对立面,再次闪耀出其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影

响力、号召力,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魏晋时期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反思神学危害,巩固政治统治的首选。魏晋玄学的理论家们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在抽象的本体论层面上将儒、道双方的合理内核整合为有利于形成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整体,将儒学注重济世安民的社会效益与道学追求个人修养的生命哲学统一起来,从而实现对儒学和道学的超越。玄学兼综儒道的价值取向既完成了玄学的政治使命,也影响着魏晋时期知识分子政治与人格双层价值标准的形成。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言:“魏晋教化,导源东汉。王弼为玄学之宗,然其立义实取汉代阴阳家之精神,并杂以校练名理之学说,探求汉学蕴涵之原理,廓清其虚妄,而折中之于老氏。于是汉代经学衰,而魏晋玄学起。”

从社会背景来看,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社会风气也促成了玄学的兴起。魏晋时期,纲常名教的伦理价值受到空前挑战。儒学代表孔融曾与祢衡谈论父母之情的问題,认为父之生子,实为情欲所发,谈不上父子有亲;子之于母,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亦谈不上母子有情。此种言论足见魏晋时代礼法废弛的混乱情况。更有甚者,魏晋时期的妇女也一反正统的“妇德”,混迹男人之间,游山玩水,欢歌饮酒。又如《晋书·阮咸传》载,阮咸“任达不拘”,纵情越礼,甚至在居母亲大丧时,还与姑母的奴婢私通。他与阮氏宗人饮酒,不用酒杯,开怀浪饮,直喝得人禽不分;刘伶嗜酒如命,长乘鹿车,携酒壶,并嘱咐仆人说,如果自己突然死去,就地埋下即可,荒诞可见一斑。魏晋人以道家哲学消解儒家伦理对人性的束缚,形成思想解放、个性自由、反叛儒教伦理的社会风

气,极大地促成了魏晋玄学的兴起。

从人才背景来看,魏晋时盛行的家学家风为玄学的兴起提供了人才保障。与汉帝国中央集权的崩溃同步,魏晋大家族纷纷崛起。朝廷对思想、学术的控制大大削弱,家学家风开始兴盛。家学家风的熏陶对王弼、裴頠等大家的玄学思想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王弼的父亲王业被过继给王粲,所以,王弼秉承了王粲的家学,在不到 20 岁时就达到了极高的学术修养,成为正始玄学的集大成者。裴頠的叔祖父裴徽就是一个有名的玄学家。“父亲裴秀十余岁,有诣徽者,出则过秀”。可见,裴秀与一些玄学名士亦多有接触。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裴頠的生活和思想必定要受到玄学名士的一些影响。总之,魏晋玄学名士年轻化的趋势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家学家风的重要意义。

魏晋玄学的发展流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玄学家发表思想的时间、性质及影响来看大体可分为创立、发展、成熟、衰落四个阶段。这种阶段性特征的形成除了玄学理论内在矛盾推动自身发展外,还与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阶段性息息相关。因为玄学家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当时有影响的玄学名士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他们与现实政治有着密切、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所以,玄学的发展流变直接受到社会上层政治势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围绕着曹氏与司马氏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斗争的力量对比而展开的。玄学家清谈寄意玄远,表面上、形式上虽然不谈政事、远离现实,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实质上并非如此。

玄学的第一阶段为创立阶段,即正始玄学,具体指曹魏

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约十年的时间。正始玄学的主旨是“贵无”,代表人物何晏、王弼,他们主张以老子道家思想来阐述孔子儒家观念,认为“名教合于自然”。他们一方面畅言老子,在思想学术领域倡导自由风气,发起对汉儒经学的思想革新,自觉构建儒道兼综的名教信仰。另一方面则积极培养、发现更富有理论朝气的少年英才。在何晏、夏侯玄的影响和提携下,裴秀、钟会、王弼等一批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贵族少年脱颖而出,这些人在家学家风的熏染下都有极好的文化素养和文化遗产,成为正始玄学的骨干力量。王弼(公元226-249年),字辅嗣,是正始玄学的集大成者,深得何晏赏识。他与何晏等标举“贵无”之论,多维度论述了“以无为本”的玄学思想,轰动一时,二十出头便成为一代玄宗。王弼的玄学奠基于《老子》《周易》,曾发表“圣人体无”及圣人与老子同的精辟见解,令吏部郎裴徽倾倒。代表作《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至今仍为人们研究易、老哲学的重要文献。在魏晋玄学所清谈的有无之辨、言意之辨、名教与自然之辨等重要问题上,王弼援道入儒,以老解易,均提出一家之言,使何晏的贵无论系统化,因而成为魏晋玄学真正的奠基者。

第二阶段为发展阶段,时间约在魏嘉平之后共十三年时间,亦称竹林玄学,代表人物嵇康和阮籍,侧重于喜好和宣扬庄子的逍遥思想,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以抨击司马氏虚伪的儒家说教和朝政。正始十年(249)司马懿突然发动高平陵政变,摧毁曹爽集团,控制了朝政大权。正始名士的中坚人物何晏、夏侯玄等被灭族诛杀;王弼也因株连免